目 录

引言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与伟大历程.....1
第一章 胜利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6
第二章 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职务十一大未能完成拨乱反正.....30
第三章 深入揭批“四人帮”努力恢复国民经济.....51
第四章 迅速恢复全国高考制度教育工作率先拨乱反正.....69
第五章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92
第六章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改变中国命运的36天.....104
第七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转折.....117
第八章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震撼中国.....131
第九章 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完成拨乱反正历史任务.....163
第十章 农村经济改革实现突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187
第十一章 邓小平设计政治改革蓝图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227
第十二章 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初步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275
第十三章 实现军事战略方针转变完成百万大裁军任务.....290
第十四章 设计中国现代化的宏图“三步走”战略逐步形成.....318
第十五章 中共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329
第十六章 努力进行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深化改革.....340
第十七章 对改革开放10年深刻反思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367
第十八章 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新的改革开放大潮涌起.....387
第十九章 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437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444
第二十一章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悼念.....461
第二十二章 中共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465
第二十三章 政府机构改革成功进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较大发展..473
第二十四章 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483
第二十五章 提出“一国两制”构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49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十六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施“走出去”战略 518
第二十七章 制定面向新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533
第二十八章 实现军队和国防建设两个根本性转变 546
第二十九章 实施跨世纪国际战略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 560
第三十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及其历史地位 577
第三十一章 中共十六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594
第三十二章 当代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有效实施 609
第三十三章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结党的执政经验 635
第三十四章 中共十七大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650
第三十五章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内涵及历史地位 664
第三十六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基本任务 687
第三十七章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697
第三十八章 万众一心抗击南方暴风雪众志成城抵御汶川大地震 ..721
第三十九章 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中国赢得世界尊敬 739
第四十章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全面部署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751
第四十一章 从容应对全球金融风暴中国日益彰显信心 759
结束语 总结改革开放30年成就与经验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783
后记 795

引言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与伟大历程

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缘起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任务，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体现，使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的复兴。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

首先，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和浩劫，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中国再也不能这样走下去了！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号召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

其次，从外部情况看，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奋力追赶时代前进潮流。

因此，30年前中国之所以选择和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双重逼迫”的产物。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但肯定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走到了低谷、绝路、死路，一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不能不使人们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担忧，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的认识与反思。历史就是如此辩证：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向了绝境，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呼声或许不会那么强烈、那么坚决、那么不可摇撼和不可战胜。坏事变好事，因为它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是这样辩证认识这一问题的。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给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契机。没有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就不会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不会打破坚冰、拨乱反正，就绝不会有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而言，我们怎样高度评价粉碎“四人帮”的意义恐怕都不为过。

尽管粉碎了“四人帮”，但是一切习惯势力、一切旧势力是不会迅速自愿推出历史舞台的。积弊已久，积重难返。中国要选择和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又谈何容易！所以，30年前，改革开放这个选择，本身也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经过两年的徘徊时期，经过萦绕不绝的痛定思痛，经过同仍然继续坚持“左”的惯性思维力量的反复的较量和斗争，经过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才终于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走改革开放之路。在这场历史性的选择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展现自己的大智大勇，高瞻远瞩，拨雾见云，把中国这艘遍体鳞伤的巨轮引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航道。正是因为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社会才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试想：如果当初不作出这样的选择，或者作出别样的选择——继续闭关锁国，继续故步自封，继续陷在僵化封闭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背离，那么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呢？现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是怎样的一个面貌呢？现在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会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呢？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说，如果没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年披荆斩棘的壮举，就不会有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坚冰已经打破，迷雾已经拨散，航道已经开辟，航船已经升火，舵手正在挥手！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图大业就是由此缘起，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揭开辉煌壮丽的篇章的！

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和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2008年已经进行了30年，大致可以分为4个重要阶段。参引逄锦聚著《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基本经验》一文。

第一阶段：改革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10月)。改革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张包产到户的约定上按上自己的手印，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在这一阶段，理论创新和思想准备也完成了三个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到大胆改革。我国进入一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第二阶段：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探索阶段(1984年10月—1992年1月)。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进入这一阶段的标志。在这一阶段，我国经受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和1988—1991年经济发展剧烈波动的考验，我们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积累了经验，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阶段，理论上也取得了突破：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第三阶段：全面推进，改革攻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进行综合改革阶段(1992年1月—2002年10月)。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进一步巩固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国的指导地位，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阶段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探索中，在实践上，我们曾经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经济风险的考验，积累了消除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通货紧缩的经验，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理论上，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四阶段：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年11月—2008年12月)。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总结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十六大以来，我国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金融、财税、投资、价格、科技等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宏观调控继续改善，政府职能加快转变，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实施走出去战略迈出坚实步伐，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同时，我国已初步形成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四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新格局。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作了全面部署，是改革开放新阶段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大成果，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的影响。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农业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这一阶段，我国万众一心抗击南方暴风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大地震，成功举办了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和不

可战胜的精神！面对美国华尔街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计划投资 4 万亿元，彰显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储备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从容不迫的信心！

现在，就让我们展开书卷，阅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伟大历史篇章，领略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一往无前的宏大魄力吧！

第一章 胜利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6年9月9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顿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1976年不到1年的时间里，巨星陨落，天柱倾折，中国相继失去周恩来、朱德、毛泽东3位伟人。广大人民群众悲痛欲绝、泪湿衣襟。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他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悲痛。

此时，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的“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果断措施，胜利粉碎了“四人帮”集团。

一、“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四人帮”就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中央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江青还想方设法盗窃毛泽东保存的文件、材料和手稿，企图加以篡改，作为篡党窃国的依据。

姚文元等还公开动员和秘密串联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

与此同时，“四人帮”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写进《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中，于1976年9月16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从9月17日起，姚文元不断给新华社打电话，再三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各中央新闻单位据此对“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进行了反复的重点宣传。

“四人帮”伪造并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这一“临终嘱咐”的目的，是想造成一种毛泽东在临终时给他们作了“临终嘱咐”的假象，借以打

着毛泽东的旗号，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既定方针”，继续打击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其实，毛泽东在临终前一直处于弥留之际，昏睡不醒。1976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抢救，又不断陷入昏迷状态。即使如此，每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还是要看书。他语言的含糊与声音的微弱，连最能听懂他讲话的机要秘书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他示意给他拿过纸和笔来，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了个“三”字，给了机要秘书，然后又用手敲敲木床的床头。机要秘书这才猜出了他的意思，他是要看关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时正是三木武夫准备下台的时候，当秘书找来介绍三木武夫的一本书，拿给他看时，毛泽东点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神态。但是，毛泽东的手已经没有托住三木武夫这本书的力气了，尽管这是一本很薄很薄的书，只好由别人为他托着。毛泽东看了几分钟，就又昏迷过去了。三木武夫的这本书是毛泽东阅读的最后一本书。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清醒的瞬间，还在关注着世界形势和五洲风云。按照多年养成的老习惯，新华社每天编辑的两大本反映世界各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动态的《参考资料》，毛泽东无论多忙多累，也是要亲自阅读或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的。

所以说，毛泽东在临终之前，根本没有作过任何“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

9 月 19 日，江青打电话给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要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并提出她和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以及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毛远新都要参加会议，却不让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以便研究江青提出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华国锋问江青：“会议讨论什么问题？”

江青说：“有紧急事情，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

江青又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纠缠着要求华国锋同意将毛泽东的所有文件、档案、资料、手稿交给毛远新整理，企图由她来垄断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手稿等资料，以便随时可以伪造和篡改毛泽东的指示。

在9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公然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的问题，图谋篡权。会前，从1975年下半年起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联络员的辽宁省委书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曾经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毛主席逝世了，我的联络员使命也结束了”，要求同意回辽宁省委工作。但是，当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同意让毛远新回辽宁的时候，江青却大发脾气，坚决反对。张春桥也提出毛远新不能走，要让毛远新整理毛泽东留下的手稿、资料，要由毛远新“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等等。

当“四人帮”的无理要求均遭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否决之后，江青破口大骂，胡搅蛮缠，闹得政治局会议开不下去，只好不了了之。

以后，江青又多次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汪东兴征求了叶剑英的意见后，予以坚决拒绝。

在此期间，“四人帮”频繁活动，与上海的同党之间“热线”不断。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要“闹事了”。如果“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党和人民就要遭难，中国的历史就不知道又要倒退多少年。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准备粉碎“四人帮”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毅然决然地站到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第一线。

华国锋，山西人，原名苏铸。他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工作，“华国锋”的名字就是取自“中华民族解放先锋”之意。他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锻炼成长为一名中共县委书记。在解放战争后期，他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担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国锋历任中共湖南省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区行政公署专员、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受到批斗。以后，他历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9.13 事件后，华国锋被毛泽东选拔到中央工作，历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从 1976 年起，他相继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与华国锋在一起。

叶剑英，广东人，早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随即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为黄埔军校筹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他率部先后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 2 师师长等职。

大革命失败前夕，1927 年 7 月上旬，经共产党员介绍、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担任国民革命军第 4 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充满艰辛与辉煌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历程。7 月中下旬，他与贺龙、叶挺等在九江甘棠湖一艘小船上秘密开会，通报了汪精卫等打算借召集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之机将他们扣留的消息。这促使贺龙、叶挺及时率部进驻南昌，举行南昌起义。同年底，叶剑英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红军副总指挥。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剑英于 1928 年奉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0 年回国，1931 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司令员、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 4 局局长。

长征中，叶剑英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 1 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 1、2 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后，叶剑英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副司令员兼军委第 1 局局长，负责部队的行军作战。遵义会议期间，叶剑英在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处理军务，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会后，叶剑英任红 3 军团参谋长。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叶剑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这时，张国焘反对中央的正确路线。叶剑英截获张国焘打给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后，及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果断决策，率中共中央、军委纵队和红 1、3 军脱离危险区域，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叶剑英在这一关键时刻的重要行动，保卫了中共中央，保证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长征胜利后，叶剑英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兼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西安事变爆发后，叶剑英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剑英任八路军总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武汉、重庆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常委，中央军委参谋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剑英参加重庆谈判。1946 年 1 月，叶剑英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同美蒋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叶剑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南局代理第一书记。

1954 年以后，叶剑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察部代部长。他于 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8 年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 年庐山会议

后任中央军委常委，1961 年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1966 年 1 月，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5 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8 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造成了全国性的混乱局面。1967 年 1 月 19—20 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拍案而起（“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叶剑英在“二月逆流”中拍桌子拍断了手指头，即指这一次造成的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怒斥江青反党乱军的种种罪行。2 月 15—16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再次挺身而出，与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一起，愤怒批判“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种种倒行逆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大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抵制“文化大革命”而进行的“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事件。“三老四帅”这种维护党的原则、维护国家安定的充满了浩然正气的举动，后来被林彪、江青诬蔑为“二月逆流”，并多次受到围攻和批斗。

在中共九大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九大前后，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与老帅们一起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为中共中央制定对苏联、对美国的战略性决策作出了贡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叶剑英奉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主持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

林彪事件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处理 9.13 事件，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中美关系局面打开后，叶剑英多次与周恩来一起同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举行会谈，并参与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会谈。叶剑英与周恩来一起促成了邓小平复出，提出要邓小平参加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4 年，叶剑英与邓小平等一起指挥西沙自卫反击战。

1975 年 2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1975 年 2 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四届全国人大上，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1975 年 6—7 月，叶剑英与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重要讲话，贯彻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重要指示。会后，叶剑英调整军队各大单位领导班子，有力地排除了“四人帮”插手军队的图谋。他坚决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全国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

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一方面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经常的联系，征求他们对如何解决“四人帮”的意见；一方面经常和华国锋接触，坚决支持他顶住“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切无理要求，决不让“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同时，叶剑英与华国锋通过深入交谈，沟通思想，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达成共识。华国锋曾于 1977 年 3 月 22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政治局不少同志都进行了接触，进行过酝酿。”

在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的生死搏斗过程中，汪东兴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早年参加革命，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中，他先在军队卫生系统从事政治工作，以后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任室副主任、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从此开始担负起保卫中共中央、保卫毛泽东的重任，与毛泽东朝夕相处、转战陕北。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第 8 局副局长。1953 年后，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任公安部第 9 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58 年，他根据毛泽东下去锻炼的指示，到江西工作，任省委常委、副省长。以后他返回北京，仍负责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的保卫工作。1965 年他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1969 年他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 年他跟随毛泽东视察南方，在 9.13 事件中保卫了毛泽东的安全。1973 年他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

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汪东兴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长，是中央警卫部队 8341 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汪东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华国锋、叶剑英通过几次与汪东兴的谈话，了解到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是坚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立场上的。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一定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至于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与此同时，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还与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要负责人粟裕、宋时轮，总参谋部主要负责人杨成武，总政治部主要负责人梁必业，空军主要负责人张廷发、吴富善，海军主要负责人萧劲光、苏振华，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傅崇碧，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吴忠、吴烈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要求他们加强战备，掌握好人民解放军各个总部机关和各大单位，掌握好陆海空军和海防边防，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对付一切突发事件。

9 月 21 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元帅派革命战争年代的老部下、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去找叶剑英，建议“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聂荣臻回忆录》中写道：林彪自取灭亡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阴谋篡党夺权，为非作歹，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1976 年 4 月，波澜壮阔的天安门事件，是对“四人帮”的一次群众性声讨，结果遭到了疯狂镇压。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病重和逝世前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全党和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极大的愤怒，忧心忡忡。我也和大家一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担忧。1976 年 9 月 21 日，杨成武同志来看我，他谈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我把我的担忧心情也向他说了，要他马上到叶剑英同志那里，转告叶帅：“‘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

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成武同志当即去了叶帅那里，回来对我说，叶帅与我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并立即搬家，以防意外。10 月 5 日，叶剑英同志又要成武同志告诉我，已经商量好了，要我放心。

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到叶剑英住地，两人携手进屋坐下后，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指‘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

隔了一天，叶剑英亲自去拜访华国锋，两人单独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成员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研究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中央重要新闻单位的人选。

三、粉碎“四人帮”的决战前夕

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下定决心，要彻底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为党、为人民、为国家铲除这个制造了十年动乱，弄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的祸害。

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达成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一致意见后，开始部署如何选择适当时机、采用适当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了。

当时，有人主张用召开中央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认为：“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一般的斗争，其性质已经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采取特殊方式彻底解决。

华国锋、叶剑英经过与汪东兴的几次商量，最后决定：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隔离审查，采取果断措施，彻底解决，然后立即召

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向会议报告。叶剑英说：“这是一着很险的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这时，“四人帮”更进一步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10月1日，江青来到清华大学，把邓小平诬蔑了一通，说：“‘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4月4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2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指王洪文1975年回上海‘调查研究’后，又返北京——引者注），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作了总结，主要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在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江青说，要准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10月初，张春桥在一个提纲中写道：“历史与现实。如今。时代。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10月2日，王洪文让摄影人员一次给他拍摄了身着中山装、军装的标准照、办公照114张，并从中选定了标准照，指令让人按照周恩来的标准照进行修版，准备上台时使用。

10月3日，王洪文到北京郊区的平谷县，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今后还可能出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

姚文元则控制着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宣传“四人帮”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大造舆论。

在“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四人帮”的同党连续向被他们操纵的“上海工人民兵”突击发放各种枪炮74000多件、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